

· XXXX ·

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思路

——兼论中国特色货币政策探索历程与东财贡献

连英祺，宗计川

(东北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摘要：真正具有解释力与指导意义的货币政策理论，不是悬浮于现实之上的抽象模型，而是对特定国家发展道路、金融结构、制度安排和各类风险挑战的系统回应。只有立足本国实践深化理论阐释，方能在政策层面牢牢掌握宏观调控的主动权。本文系统梳理了货币政策研究发展简史和1949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着力揭示货币政策理论演进与时代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一方面，从国际视角出发，考察不同历史阶段主流货币政策理论范式的形成背景和适用边界，分析其与各国经济结构、制度环境、风险冲击之间的互动逻辑。另一方面，立足中国经济体制变迁与发展阶段转换的宏观背景，梳理中国货币政策研究从学习借鉴起步，逐步转向以本国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自主建构阶段，并进一步迈向体系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探讨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思路，并结合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科的长期求索与实践，总结探索中国特色货币政策和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东财贡献。

关键词：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东北财经大学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XXXX)XX-0001-15

一、引言

货币政策理论的演进并不是一条单纯由分析工具升级所驱动的线性演进路径，而是一个不断被现实问题重塑、被制度约束修正并最终通过历史实践检验其有效性的过程。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框架的确立，还是20世纪70年代滞胀冲击下货币主义、理性预期革命与货币政策规则论的兴起，抑或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稳定重新进入货币政策核心议程，其背后均不是某种抽象理论逻辑的自我展开，而是既有解释框架在面对新的经济结构、风险形态和治理任务时不断被挑战、修正、拓展的结果。具备持久生命力的货币政策理论从来不是超脱特定国家制度条件与发展路径的通用理论范式，而是能够扎根本国国情、有效解释本土经济金融运行规律的系统性知识体系。只有从本国实际问题中提炼出更有解释力的概念、命题和分析框架，才能真

收稿日期：2026-05-13

作者简介：连英祺（1978-），女，山东荣成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公司金融、资本市场、可持续金融研究。E-mail: lianyq@dufe.edu.cn

宗计川（通讯作者）（1976-），男，山东淄博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金融稳定、实验金融研究。E-mail: zong@dufe.edu.cn

正掌握货币政策理论的主动权。围绕货币政策理论演进，既有研究多从国际主流理论范式更替或政策工具演化出发，对不同阶段的理论特征作出系统梳理。然而，这类研究往往以西方经验为参照，对理论与特定国家发展条件、制度结构及风险约束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整体性解析；对于中国货币政策研究如何由学习借鉴走向自主重构，并进一步形成体系性表达，也有待置于更长的历史周期与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加以梳理。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问题具有更为突出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作为一个在较短时期内先后经历计划体制、经济转轨、高速增长并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大国，中国货币政策研究所需应对的不仅是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单一目标的通货膨胀治理问题，而是与工业化推进、财政金融关系重构、银行主导型融资结构形成、对外开放进程及系统性风险防控紧密交织的复杂治理问题。如果在这一过程中长期停留于对西方既有框架的简单跟随、机械修补乃至生硬套用，就不可能完整把握中国货币金融运行的真实逻辑，也无法形成足以服务中国治理实践和发展战略的理论体系。从这个角度看，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补充，更是中国货币金融研究必须完成的理论转向。鉴于此，本文在立足国际视角梳理货币政策理论演进脉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由学习借鉴走向自主重构的历史过程，并进一步分析东北财经大学（下文简称“东财”）在这一过程中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本文尝试说明，中国货币政策理论的发展并不是对外来框架的简单接受，而是立足中国现实问题、本土实践经验与特有制度框架逐步形成本土概念、命题和学术体系的过程。东财的相关探索则为理解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及其未来推进方向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视角。

二、货币政策研究简史

从全球范围看，货币政策研究并不是沿着单一线索展开的，而是在重大历史冲击、制度条件变化与治理目标调整中持续修正、拓展和重构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重建需求、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冲击、理性预期革命与货币政策规则论的兴起、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稳定问题的重新凸显，以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通货膨胀回归的担忧、不确定性上升和政策权衡复杂化，共同推动了货币政策理论框架的阶段性转换。围绕这一演进历程，学术界与政策界长期讨论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稳定产出和就业？中央银行应更多依赖相机抉择还是货币政策规则的约束？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如何协调？在外部冲击加剧、预期变化和金融脆弱性上升的条件下，既有政策框架应如何作出进一步调整？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时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框架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全球货币政策理论的发展深受冷战格局、福利国家扩张及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等制度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防止大萧条时期总需求急剧收缩和大规模失业的情况再次发生，充分就业、总需求稳定和国内经济恢复成为各国政策安排的优先目标。在此背景下，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逐渐居于主导地位。货币政策虽然已成为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以有效需求、投资波动和产出一就业关系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中，货币政策的功能定位更多是通过利率、流动性偏好和投资渠道嵌入需求管理过程，尚未被普遍视为能够独立承担宏观稳定任务的核心工具^[1]。

然而，同期的中国货币政策研究主要围绕计划经济条件下货币流通如何服务和适应国民经济运行展开^[2]。当时银行信贷并未成为市场化调节机制，而是将其置于服务生产、支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加强经济监督的制度框架中；信贷监督也被赋予改善企业经营、规范资金使用和协调银行与企业关系的重要功能^[3]。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重点在于探究如何通过投放、回笼与计划管理使货币流通同国民经济运行相协调。中国与西方国家虽处于不同制度语境，但均将货币问题置于恢复

经济秩序和稳定内部经济的现实任务中来作出探讨和分析。

（二）滞胀冲击与通货膨胀上行压力下货币主义与预期修正分析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后期,传统凯恩斯主义框架在通货膨胀持续攀升且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稳定权衡关系受到质疑的背景下,逐渐遭遇挑战。随着美国财政扩张、布雷顿森林体系承压及通货膨胀水平持续抬升,西方货币政策分析的重点开始从静态的总需求管理,转向预期修正、自然失业率、动态调整机制和长期货币中性理论等现实问题^[4-5]。扩张性政策难以在长期内将失业率维持在自然失业率以下,反而可能通过公众预期调整引发更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一判断逐步成为该阶段货币理论演进的重要共识。

这一时期的中国货币政策研究仍主要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之内展开。相关讨论集中于商品—货币关系、货币流通规律及货币流通边界等主题,关注重点在于揭示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数量关系、制度关联和运行秩序,而不是现代中央银行意义上的货币政策规则设计、利率调控机制和通货膨胀预期管理^[2, 6]。1979年前后,随着学术期刊陆续恢复出版和经济理论讨论逐渐活跃,中国货币政策研究开始重新接触西方货币制度和国际货币改革等现实问题,研究视野逐步拓展到现代货币制度与国际货币体系^[7]。

（三）持续高通货膨胀与相机抉择困境下货币政策规则论与理性预期分析的成型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现代货币政策理论进入重要转型阶段。滞胀和持续高通货膨胀的现实情境使学术界与政策界逐步认识到,单纯依靠传统相机抉择政策难以维持价格稳定,货币政策分析由此转向规则约束、预期调整和制度安排等现实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理论界更加重视私人部门预期、政策信誉和规则约束等现实问题。由此,时间不一致、通货膨胀偏差、信誉约束和可信承诺逐步成为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重要命题^[8]。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分析思路进一步发展为对系统性政策反应函数的规则化表达,中央银行独立性、规则优于相机抉择和反通货膨胀信誉等现实问题也随之成为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核心议题^[9]。

与同期西方关注点不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现实关切更多落在综合平衡、信用约束及财政与信贷协调之上。货币流通稳定、信用扩张控制、财政收支与信贷收支衔接及物价控制之间的协调关系,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主线,总量平衡和信用约束则构成了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10]。与此同时,银行体制改革、中央银行调控条件等制度性问题也开始被纳入中国货币政策的研究视野,使货币问题的讨论不再局限于传统流通分析,而是逐渐转向更具有宏观调控含义的制度安排研究^[11]。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汇率改革、国际收支和国际货币体系等外部均衡问题也开始被纳入中国货币理论研究范围,表明这一时期的研究视野已由国内流通与信用问题,逐步拓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金融运行。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研究并未简单照搬西方“规则—预期—信誉”的逻辑框架,而是在本土语境中围绕总量控制、信用约束、财政信贷协调和外部均衡等现实问题构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分析范式,这些前期探索也为后来中国货币政策研究向现代宏观金融分析转型夯实了前期基础。

（四）相对稳定环境下新凯恩斯主义综合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拓展

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货币政策理论进入相对成熟稳定的发展阶段,新凯恩斯主义主流框架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一框架下,中央银行既需要维持应对通货膨胀的信誉,同时也具备在价格和工资粘性存在的条件下,在短期内影响真实经济活动的的能力,由此,货币政策被置于规则约束与短期稳定并存的分析结构之中^[12]。在此基础上,通货膨胀目标制逐渐成为全球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的重要政策范式,其含义并非机械固定的政策法则,而是更接近一种强调透明度、问责性和长期反通货膨胀信誉的政策框架。

这一时期的中国货币政策研究逐步从转轨时期侧重于总量控制和信用约束,转向更具现代宏

观金融分析特征的研究议题。相关研究首先集中于货币政策监测指标体系和中介目标选择,随后进一步拓展到货币政策有效性、传导机制、政策规则检验、汇率约束和资产价格响应等现实问题,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分析框架和问题意识出现向现代中央银行理论靠拢的趋势^[13]。

(五) 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稳定议题凸显与宏观审慎研究的拓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至2020年,货币政策研究的重心发生了明显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并不必然意味着金融稳定;即便在价格水平相对温和的环境下,金融体系内部仍可能持续积累由杠杆扩张、期限错配、资产泡沫和信用链条脆弱性等引发的风险。由此,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差异被充分揭示,传统以通货膨胀控制为中心的货币政策框架也受到重新审视。在此背景下,非常规货币政策、信用摩擦和金融中介机制、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工协调,逐步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研究拓展的主要方向,金融因素也重新进入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领域^[14]。

中国在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研究转向与国际趋势类似。利率双轨制、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价格型调控框架的制度约束,以及由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型等现实问题,逐步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要内容。货币政策分析框架也由传统总量调控为主进一步转向货币政策、金融结构与宏观审慎管理相结合的宏观金融研究框架。在这一过程中,“双支柱”调控框架、货币政策规则、通货膨胀预期、不确定性冲击、利率与汇率协调、中介目标重构和市场利率体系建设等现实问题被持续纳入研究视野。这表明,中国货币政策研究已从单一工具或单一目标分析,逐步转向更加重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多目标、多工具分析框架^[15]。

(六)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通货膨胀隐忧重现与供给冲击加剧下货币政策框架重估

2020年以来,全球货币政策研究进入新一轮调整期,这一时期的基本背景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供应链紊乱、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经济重启后的需求修复及地缘冲突等多重因素相互叠加,这推动了西方多国通货膨胀水平明显上行。由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十余年间,围绕低通货膨胀、低利率和长期需求不足所形成的一系列判断受到重新审视,传统货币政策分析框架也面临新的解释压力和现实挑战。尽管这一时期尚未形成完全定型的新理论共识,但若干演进方向已经较为清晰:价格稳定仍然是主流货币政策框架的核心锚,通货膨胀目标制并未被根本放弃;如何识别供给冲击及其对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影响,重新成为理论分析和政策判断的重要难点;金融稳定与价格稳定之间的联立分析也在持续推进并逐步制度化。基于此,未来货币政策研究的调整重点已更多地落在供给冲击识别、预期管理、金融稳定约束和多目标协调等更为复杂的政策分析问题上。

在此期间中国并未出现通货膨胀问题,但货币政策研究也呈现明显的框架重估特征。面对金融周期变化、经济转型约束和外部冲击加剧等新情况,研究重点逐步从传统总量调控和单一工具效果分析,转向更加注重对政策规则、预期锚定和市场化传导机制的重新审视。金融周期、利率市场化改革、银行利率传导、央行沟通、自然利率、债券市场定价和政策可信度等议题相继进入研究视野,表明中国货币政策研究更加关注深度剖析制度约束、市场反应与预期形成之间的内在关系^[16]。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研究的核心变化,不是对既有框架的简单否定,而是在结构性政策、数字货币、外部冲击和市场化传导等新约束下,重新评估规则、工具与目标之间的适配关系。

三、中国特色货币政策研究的探索历程

对中国而言,货币政策问题从不只是成熟市场经济语境下的总需求管理问题,而是与币值稳定、实体经济运行、金融结构变迁和制度转型过程紧密交织在一起。1949—2012年,是新中国

货币政策研究由学习借鉴和选择性吸收既有理论, 逐步转向立足中国现实问题, 尝试进行自主解释与理论重构的关键阶段。在这一过程中,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 学者们在货币政策研究方面的探索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 实体经济约束下的货币流通管理与主权确立

1949—1978年, 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早期脉络应被置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财经、恢复生产及随后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制度背景之中加以理解。如何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中保持币值稳定、商品流通顺畅并筑牢货币发行的国家信用, 这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彼时价格体系尚未完全市场化, 资源配置主要依托计划安排, 财政、信贷与商品供给呈现深度耦合特征, 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重点在于使货币供给与实体供给能力、商品流转规模及再生产秩序相适应。在此情境下, 以市场价格信号自动调节为前提的西方货币数量论难以直接适用于中国国情, 学者们围绕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的存在逻辑、运行机制及其供给边界等核心议题, 针对社会主义货币流通规律开展了开创性理论探索。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根基, 相关研究将《资本论》中关于价值形式、一般等价物和货币流通规律的经典原理, 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本质、货币流通边界和货币流通管理问题结合起来, 解释货币如何同实体供给、商品流转和计划管理相衔接^[6, 17]。学术界围绕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范围和运行条件展开讨论, 强调应从社会生产关系和计划经济条件出发理解其制度属性^[17]。面对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冒进倾向, 这一时期的研究强调货币发行并非取决于主观意志, 而是受货币流通客观规律制约, 主张通过计划管理使货币投放、回笼与国民经济运行保持综合平衡^[2, 6, 18]。与此同时, 学术界系统探讨了市场货币需求量的测算、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投放与回笼及银行信贷计划平衡等现实问题, 论证了货币流通必须与商品流通、物资周转和国民经济计划运行相适应^[2, 18]。这些研究, 连同关于银行性质、稳定货币目标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的学术辨析, 共同表明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逻辑起点并非中央银行如何通过利率调节总需求, 而是货币如何嵌入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并服务国家发展目标。这些成果回应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货币如何运行的理论命题, 明确了货币运行的制度边界和实体约束逻辑, 初步实现了从“解释别人”向“解释自己”的历史性转向, 为后续从实体约束逻辑迈向制度调控逻辑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 信用扩张压力下的调控机制探索与职能重塑

1979—1992年, 伴随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投资冲动增强、价格波动加剧, 以及信贷扩张反复突破总量约束等新问题的出现, 单纯依靠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已难以适配市场化因素增多背景下宏观稳定、经济发展的双重诉求。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重心逐步转向探究信用扩张的形成逻辑、银行体系的调节机制和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路径。特别是1983年国务院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 货币调控有了更为明晰的制度依托。与此同时, 相关讨论逐步从一般性的货币流通和信用问题, 进一步推进至中央银行职能定位、货币发行制度设计和宏观调控体系构建等更具操作性的议题。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 这一阶段的中国货币政策研究进一步夯实了金融宏观调控维度的理论探索。相关研究将货币流通总量与信贷投向纳入银行宏观调控的重要范畴, 强调信用扩张对货币流通总量具有关键影响, 中央银行应依据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合理确定信贷投放规模与方向^[19]。也有研究从银行贷款与货币供应关系出发, 指出贷款是货币供应的重要闸口, 贷款规模和投向需同存款和现金结构、物资运动及经济效益相适应, 以防止货币供应超过经济需要^[20]。针对货币供给波动, 相关研究围绕货币供给的数量测算、统计口径与调控方式展开, 既将基建投资、价格变动、消费基金增长和信贷发放纳入分析框架, 也从现金发行量、信贷规模和中央银行贷款额等环节讨论货币供应量调节问题^[21-22]。伴随中央银行专门调控职能的正式确立,

相关研究进一步聚焦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将调控机制的研究重心下沉至专业银行、商业银行及各类金融工具的传导环节,并探索构建以金融调控为主体、具有市场化取向的间接调节体系^[11, 23]。针对阶段性通货膨胀、信贷投放与货币发行不够稳定等现实问题,学术界提出差异化调控思路,主张对基建类贷款与创汇、货币回笼类部门贷款实施差异化管理。与此同时,相关研究明确在央行与专业银行宏观调控职责的框架下,统筹平衡货币总量、信贷规模与宏观结构,避免行政管控手段快速弱化、市场化调控手段尚未完善带来的调控真空^[24-25]。另有研究指出,彼时存在金融市场机制有待完善、信贷政策适配性有待增强、金融中介功能尚未完备等现实问题,这显著制约了要素流动、企业兼并重组与规模经济形成,凸显了金融体制改革对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作用^[26]。上述系列研究表明,这一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研究回应了商品经济发展背景下如何构建适配国情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现实命题,推动研究范式由依赖行政额度管控的经验式研判,逐步转向兼顾制度机制分析、数量测算与结构约束优化的多元分析框架,为深化学术界与政策界对金融宏观调控的认识提供理论参考。

(三) 内外均衡约束下的货币政策体系化表达

1993年,国务院印发《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实行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并发展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此后至2011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银行体系在融资配置中继续居于核心地位而融资渠道也日益多元化。1994年汇率并轨、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1998年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并设立跨省区分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3年分离银行监管职能及修正《中国人民银行法》、2005年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制度、2009年以后逐步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这一系列贯穿金融转型进程的制度变革与机制调整共同推动金融宏观调控走向法治化、规范化和市场化,并逐步增加对间接调控工具的运用。相应地,中国货币政策研究所面对的约束逐步由国内货币信贷总量管理扩展到在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及金融稳定之间的协调。学术界关注的研究议题也由中央银行制度和货币供给机制,逐步扩展至中介目标选择、利率与信贷传导、政策效果识别,以及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自主性和金融稳定边界等现实问题。

伴随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框架逐步确立,货币政策调控的目标体系与运行机制也需要进行系统性调整。这一时期的研究首先将币值稳定与经济适度增长的协调关系纳入核心政策框架,明确反对以高通货膨胀换取短期高增长率的路径,并探索构建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双目标体系,对多重政策目标予以量化锚定^[27-28]。在银行主导型融资结构的基本特征下,早期实证研究验证了信用渠道和信贷总量在政策传导中的核心作用;后续研究进一步将金融状况指数、资产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预期纳入分析视野,推动货币政策传导分析从单一货币供应量,逐步拓展至兼顾信用总量与金融市场运行状态的多元视角^[29-30]。针对扩张性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内需启动乏力的现实困境,相关研究从微观预期和体制约束层面展开解构,指出居民收入预期、银行风险偏好、企业投资意愿、信贷结构刚性和深层体制约束,共同重塑了政策传导的实际效果。基于此,相关研究主张,应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结构性信贷定向安排与配套体制改革共同发力,提升宏观调控的整体有效性^[31-33]。

随着对外开放进程持续深化,相关研究将外汇占款变动、基础货币投放、资本流动管制、汇率制度安排和政策组合策略纳入开放经济分析框架,阐明了标准开放经济模型必须结合中国特殊制度条件加以本土化修正的内在逻辑^[34-35]。与此同时,银行监管效能、金融风险防控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逐步进入中国货币政策研究范畴,价格稳定、金融稳定和逆周期调节开始被置于统一框架下展开系统性讨论^[36-37]。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视野进一步延伸至社会心理和微观行为维度,将人民立场内嵌于理论研究脉络,凝练出本土金融学的价值内核^[38]。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学

术探索,其最重要的进展并非修正某一政策工具或中介目标,而是要构建一套更贴近中国客观实际的政策框架。这一努力夯实了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的学理根基,实现了货币政策研究范式的系统性转变。

四、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思路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时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立足金融发展实践作出论断:“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将这一根本遵循落实到中国货币政策研究领域,可以发现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要义在于,以中国货币政策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在科学方法论的指引下,系统阐释中国特有制度环境、金融结构与政策传导机制的内在逻辑,进而将根植于本土实践的经验认识升华为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理论成果。为此,中国货币政策研究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兼具重大现实意义、复杂实践约束和鲜明理论潜质,支撑起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基础和发展方向。

(一) 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将经典理论进行本土化适配与情境修正的同时,更加关注如何在经济新常态运行、系统性风险防控与多重外部冲击交织叠加的现实背景下,将总量调控、结构调节、风险治理、开放约束和价值取向进一步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学术界就此开展的系列探索有效拓宽了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理论边界与分析视野,也为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积淀了扎实的方法基础与理论基础。

1. 经济新常态下的调控逻辑转换与框架重估

2012—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的特征逐步显现。这一时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总体回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传统产业和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的调整压力加大,地方政府性债务进入审计、预算约束和存量置换阶段。2014—2015年,部分地区房地产库存压力上升,而随着落实去库存政策和住房信贷扩张,2016年,部分城市房价及房地产贷款又较快增长;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理财等表外或准表外信用活动的发展,也增加了监管套利、期限错配和货币政策传导绕道等风险。与此同时,国际主要发达经济体非常规宽松政策及其退出节奏分化,通过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预期和外汇占款变化影响国内流动性条件,增加了国内增长、汇率稳定和跨境资金流动之间的协调难度。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所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如何保持流动性合理适度、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疏通利率传导,并防止宽松条件过度流向房地产和表外金融。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及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 MLF)等工具运用的增加,如何形成由央行操作利率向货币市场利率和银行贷款利率传导的价格型调控机制,并实现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研究议题。

在方法论层面,相关研究系统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学科应具备的思想性、时代性、民族性等核心特征,明确提出“人民币要为人民服务,银行要为人民服务,一切金融事业都是人民的,都要为人民服务,这种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反映和客观要求。”这一观点尝试将服务于人民福祉作为中国货币政策价值取向的核心考量^[38],这一理论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主流经济学中关于政策价值中立的假设,尝试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融入货币政策目标函数,为政策制定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向注重服务实体经济深度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此同

时,相关研究逐步将行为主体的伦理约束纳入金融治理框架,并反思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和方法可能带来的适用性偏差问题。这一理论自觉推动研究重心由评估工具有效性,逐步转向深入考察银行主导型融资体系及经济转轨约束等现实基础^[39]。

在政策机制层面,相关研究将经济增速换挡期的流动性传导问题置于实体经济与金融结构的关系背景下进行讨论,认为宽流动性与融资难并存、金融与实体经济非均衡发展、资金超额流向房地产和部分产业过剩产能等现实问题,是探究如何保证流动性合理适度 and 推动融资成本下降时不能忽视的现实约束^[40]。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平台期限错配和非传统融资方式扩张等现实问题,则提示了中国货币政策研究需把财政金融边界和风险预警纳入分析条件^[41]。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与P2P活动改变信贷供给、融资成本、货币统计和社会融资规模监测口径等现实问题,表明了政策传导的识别难度日益增加^[42-43]。在对货币政策作用渠道进行讨论时,相关研究深入考察了货币政策如何通过市场利率体系、收益率曲线、汇率机制和央行市场化调控框架影响资源配置效率^[44],并分别从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中的信贷约束与政策冲击、泰勒规则下的利率平滑、回购利率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联动、外部量化宽松的汇率和资本流动约束等方面,刻画了价格型调控、信贷渠道和开放经济渠道的传导条件^[39, 45-47]。

在目标边界层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被进一步确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研究中评价政策效果的规范坐标^[48]。资产负债表视角下流动性冲击、杠杆调整和跨部门风险传染的分析,则说明货币政策目标不宜停留于总量宽松或单一利率传导,还需与宏观审慎治理衔接,从而实现服务实体经济、防范资金脱实向虚和维护金融稳定三者协调适配^[49]。

2. 风险防控约束下的政策传导优化与治理框架拓展

2017—2019年,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风险治理、结构性去杠杆和经济下行压力相互交织,货币政策传导同时面对信用收缩、融资分层和风险防控等多重约束。资管业务规范化整改和表外融资收缩使传统总量投放的边际效果受到限制,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凸显银行体系传导、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和结构性信贷配置的重要性。由此,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重心从讨论宽松或收紧,拓展至在总量适度、传导疏通、结构优化和风险防控之间形成协调,并进一步探索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如何落实到具体政策工具和治理机制之中。

在政策框架层面,一方面,相关研究从中国稳健货币政策实践出发,讨论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型、利率政策规则、政策沟通与传导效率,以及货币政策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等重要议题。另一方面,相关研究将金融周期纳入货币政策规则分析,说明金融稳定因素应进入货币政策框架^[50-51]。

在工具传导层面,基于“抵押品渠道”视角,创新型货币政策的相关研究认为,抵押品范围调整能够影响银行资产配置、信用债利差和企业融资成本,从而强化政策工具向实体融资条件的传导^[52]。关于定向降准的研究则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可通过银行竞争和信贷配置机制,对三农、小微等薄弱环节产生普惠效应,推动调控思路由普遍性总量投放转向定向施策^[53]。

在风险边界层面,与金融周期相关的研究认为,货币政策需要与宏观审慎政策形成分工协同,前者关注总量稳定和整体金融稳定,后者更多处理局部金融不平衡与定向风险约束问题。围绕不良资产的模拟研究进一步表明,单纯宽松货币政策对缓解债务危机作用有限,“不良资产核销+逆周期资本缓冲”的组合政策更有助于银行体系恢复^[51, 54]。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相关研究将货币政策分析从总量投放扩展到工具结构、传导渠道、目标协调和风险边界,为理解稳健货币政策在服务实体经济与防范金融风险之间保持平衡提供了理论支撑。

3. 多重冲击下的现代货币政策框架深化与综合治理

2020年以来, 中国经济运行的约束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 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上升, 外部冲击和风险约束交织叠加, 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供强需弱矛盾、社会预期偏弱、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和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等现实问题进一步凸显。在此宏观经济背景下, 中国货币政策研究所面对的已不仅是宽松或收紧的取向选择, 而是如何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的同时, 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调节与结构优化双重功能, 并在稳增长与防风险、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形成动态协调。这一时期,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 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问题意识从工具取向和总量效果评价, 转向政策有效性生成条件的综合解释。

在方法论与主体认知层面, 面对有效需求不足、市场预期偏弱和政策传导效率偏低等现实问题, 相关研究主张将货币心理、货币行为和货币哲学观念纳入货币运行规律分析, 以更好解释金融实践中的主体反应和政策效果^[55]。在此基础上, 政策沟通模糊性、企业货币政策感知和央行沟通情绪等相关研究表明, 货币政策不只通过利率、汇率等传统政策变量发挥作用, 还会经由投资者预期、企业实业投资和资产价格机制影响宏观运行^[56-58]。

在传导机制层面, 中期借贷便利期限结构与担保品扩容、数字金融、商业信用约束和资管新规冲击等相关研究显示, 政策利率和流动性安排向收益率曲线、债券利率、信贷配置和企业融资约束的传导, 受抵押品框架、金融科技、周期状态和监管安排共同影响^[59-63]。

在结构优化和实体指向层面, 结构性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评估协调能够影响不同资质企业的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讨论也强调稳健货币政策需要精准施策, 推动金融资源直达实体经济并提高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适配性^[64-65]。

在风险约束和开放经济层面, 城投债信用风险、人口老龄化、银行风险承担、房地产下行及美国量化宽松和美联储政策冲击等相关研究认为, 中国货币政策研究需要把地方债务、人口结构、双支柱调控、房地产抵押约束和外部流动性冲击纳入稳增长、防风险和内外均衡的综合框架^[58, 66-70]。

总体而言, 2020年以来的中国货币政策研究已由单一工具效果评价, 转向围绕主体预期、复合传导、结构配置和风险边界展开的综合治理分析框架。

(二) 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总体思路

理论体系的存续活力与发展张力, 根植于其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与回应能力。通过梳理全球视域下货币政策理论的演化脉络不难发现, 各类主流理论范式的诞生与迭代, 均内嵌于特定经济体的制度环境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较于西方发达经济体, 中国在经济运行节奏、制度架构及宏观调控治理目标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这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理论研究不能简单照搬域外理论框架与实践范式。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与“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 以金融强国建设为战略引领, 立足中国金融学科本土化的历史脉络,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 深植于中国特色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土壤, 在理论创新阐释、原创性教材建设和学科体系优化等方面持续发力, 逐步形成与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相适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

从内在建构逻辑看, 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需要系统厘清三个层层递进、彼此贯通的核心问题: 一是确立实践基础, 明确本土学术理论必须根植于中国经济金融运行的鲜活实践; 二是明晰问题基础, 明确坚持以中国货币政策实施与调控过程中的现实真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主线; 三是夯实制度与学科基础, 明确要依靠成熟稳定的学术建制和学科传承实现学术成果的持续沉淀与有效转化。上述三重维度互为支撑、有机统一, 共同助力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在实践根基层面,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应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目标,坚守并深化金融为民的实践取向。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应传承“人民币要为人民服务”这一中国金融精神的内核,将其从价值理念表达转化为制度分析的逻辑起点。面向“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一系列发展目标和重要部署,应紧扣“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等核心要义,将货币政策目标提升至服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更高层次。在此基础上,后续应系统总结以稳健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服务实体经济的实践逻辑,着力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服务民生保障、就业扩容和社会薄弱环节,使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在实践维度彰显鲜明的人民性价值底色。

在问题导向层面,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应以金融“五篇大文章”为重要抓手,推动中国货币政策研究从一般性政策解释转向面向重点领域、重点人群和重点风险的综合治理分析。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并不只是金融工作的分类任务,也为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问题和理论场景。高校金融学科应围绕这些领域的金融资源配置、风险识别、预期管理、政策传导和工具协同等关键环节,提炼具有中国实践基础的研究命题,特别是深入揭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金融支持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在此过程中,研究重点应进一步将地方债务治理、房地产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数字金融监管和开放条件下外部冲击等现实约束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进而形成能够统筹稳增长与防风险、兼顾结构优化与内外均衡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

在学科载体层面,深化高校金融学科改革与组织化建设是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支撑和关键路径,其核心目标为理论成果的持续生成、系统积累和实践转化筑牢坚实保障。作为金融人才培养、理论创新、政策研究和社会服务的核心平台,高校金融学科应立足国家金融改革实践需要,紧扣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需求,将学科发展、专业调整与人才培养融入这一核心任务,构建“政、校、企、学、研、用”协同联动机制,实现学科发展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同频共振。具体而言,一方面,高校应以有组织科研强化科研团队建设,聚焦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金融安全与稳定等相关重大战略领域,搭建稳定的研究、智库、数据平台和案例研究体系。另一方面,高校应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将货币政策相关的监管难点、机构需求、改革经验和实体痛点引入教学科研,实现理论与实践双向赋能。通过课程教材建设、交叉学科布局及“双师资、双课堂、双教学”机制,推动货币政策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融入政策咨询与行业实践。借此培育可传承、可拓展的学科核心能力,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夯实学科基础。

五、探索中国特色货币政策和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东财贡献

东财在货币政策研究领域长期深耕不辍,砥砺求索、薪火相传。历届师生校友,同心笃行,始终立足中国货币金融本土实践,坚持理论探索创新,潜心投身人才培养事业,秉持服务国家宏观经济治理、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时代使命,经年积淀逐步构建起兼具本土底蕴与国际视野,融汇理论研究、政策实践与教育传承的货币政策研究体系,坚持不懈地为探索中国特色货币政策和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一) 理论探索与学术传承

东北财经学院财政信贷系(东财金融学院前身)始建于1952年,1981年金融学(原货币银行学)专业获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1986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2000年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历经七十余载的积淀与发展,依托系统完善的货币银行学教育体系及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东财在新中国货币政策演进过程中,持续厚植学术传统、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为探索中国特色货币政策和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奖人、东财金融学科创始人林继肯教授, 围绕货币需要量、货币流通规律、货币发行、社会再生产和币值稳定等现实问题展开长期研究, 提出稳定通货理论, 强调稳定货币对于经济健康运行和宏观治理有效性的基础意义, 并进一步立足行为货币学、货币心理学和货币哲学等领域展开探索, 将货币研究从数量关系、制度安排拓展到人的心理、行为和价值维度。改革开放后, 随着中央银行制度重建、银行体制改革、资金市场培育和金融宏观调控方式转变, 张贵乐、夏德仁、艾洪德、戴玉林等学者针对新问题展开系统性思考, 推动东财货币金融研究由分析社会主义货币流通规律, 进一步融入中央银行调节经济、金融市场建设和宏观政策工具选择的讨论之中。随后, 进入市场化改革深化和开放经济约束增强阶段, 在艾洪德教授的引领下, 王振山、邢天才、王志强、史永东、范立夫、郭凯等学者又将研究重心拓展到货币政策传导、金融效率、金融风险管理、通货膨胀预期和结构性货币政策等现实问题, 多角度尝试解释中国货币政策为什么必须在银行主导型融资体系、市场化转型、资本市场发展、外部冲击和金融稳定约束之间寻求最优均衡。近年来, 宗计川、康书隆、熊海芳等学者在既有基础上持续深耕, 进一步面向金融强国建设、金融安全稳定、行为金融监管、数字金融监管、政策沟通与预期管理、系统性风险模拟和区域振兴实践等现实问题, 强调将真实政策场景、市场主体行为和监管制度约束纳入货币金融分析框架。东财学者在代际接续中形成了问题意识连续、理论方向递进、研究团队接力和现实回应有力的学术传统, 并依托于这种能够在传承中持续发问、拓展、转化的能力, 在探索中国特色货币政策和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历程中不断将中国货币金融实践提炼为中国概念、中国命题和中国理论体系。

(二) 人才培养与服务社会

1964年, 在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召开的全国第一次金融教材工作会议上, 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司明确表示支持林继肯教授关于货币流通的部分研究观点, 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随后委托其主编统一教材; 1965年, 由中国人民银行统筹组织、全国多所院校联合编写的《货币流通与银行计划》教材正式出版, 林继肯教授担任主编。这些教材的编写工作, 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进入金融教育体系, 为中国货币金融教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后续, 在艾洪德教授的引领下, 东财逐步建立起完善的课程、教材、案例、实践活动等人才培养支持体系。不同版本的《货币银行学》教材先后获评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 相关课程逐步建成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陆续获评, 标志着全面形成科研促教学、教学反哺科研, 科研和教学共同支撑育人体系建设的良性循环。以“本土化、自主化、特色化”为核心逻辑, 在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实践育人层面正式构筑起了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扎实的学科生态基础和稳固长效的组织结构, 推动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实现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跨越, 为中国高校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如果脱离了人民、脱离了社会实践, 就会失去生命力。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 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东财始终积极响应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需求, 将货币金融研究嵌入政策咨询、智库建设和地方金融治理实践。林继肯教授指出“人民币要为人民服务”是中国金融业的“魂”和思想主线, 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转化为具有高度辨识度的中国命题, 引导金融研究从追求增长速度的工具理性转向服务人民福祉与实体经济的价值理性。艾洪德教授带领学校金融学科, 立足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和区域发展的实践深度, 将这一价值理念融入学科建设与科研服务。通过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重要研究任务回应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 通过推动金融学科与东北振兴、东北亚区域合作深度融合, 强化“中国金融+东北实践+东北亚合作”的特色研究定位; 搭建金融稳定研究团队、金融安全稳定智库平台, 开展有组织科研和咨政服务, 提交多项资政建议, 并被国家

级、省部级和地方层面采纳或获得批示；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五篇大文章”，通过政策宣讲、行业培训、案例研究、蓝皮书编写和研究报告发布，推动学术成果服务金融改革和实体经济发展。这些同向同行、有为有力的举措为探索中国特色货币政策和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了植根乡土、服务全局的学理支撑与东财方案。

(三) 中国经验提炼与话语体系构建

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既要扎根本土经济实际，也要敏锐回应宏观治理的现实需求。在这一建构过程中，东财的师生校友在各自的领域中回答着时代之问，贡献着东财智慧。

林继肯教授是国内最早进行金融学科独立发展探索的学者之一，他关注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数量关系和制度联系，围绕货币流通规律、货币需要量、货币本质及其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展开讨论，一再深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运行机制的分析，形成了货币核心论、货币数量新论、行为货币学等具有鲜明本土问题意识的原创性理论探索，并开创了行为货币学等新学科。将新中国货币金融运行中的真实问题转化为一套能够解释中国实践、服务宏观治理、进入教材和课堂的中国货币政策话语体系。以艾洪德教授为代表的东财学者不断充实、丰富了这一话语体系的内涵，提出“货币数量均衡”“最优货币政策混合规则”等标识性学术概念，为货币政策选择提供了本土化的逻辑支撑。与此同时，通过全面、系统的教辅体系建设与有组织科研活动，将中国货币金融实践中的经验表达进一步转化为可教学、可传播、可传承的学科话语体系。

以夏德仁教授为代表的实践型学者，秉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研究范式，将这一话语体系深度延伸到社会实践的各个层面。夏德仁教授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新一代杰出学者的优秀代表，围绕中国转型期的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展开了多层面探讨，凝练现实命题、深耕学理研究，助力政策制定、引领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他的研究成果构筑了一个以“稳定性、结构化、协同性”为核心的宏观调控理论矩阵。他主张货币供应增长率应与正常经济增长率相匹配，以此发挥“反周期”的自动调节功能，从而有效降低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他也较早讨论财政与货币政策在功能上的分工协作，这种分工协作的思想为转型期的宏观治理提供了关键的制度支撑。面对转轨期特有的结构失衡与需求约束，夏德仁教授敏锐地察觉到基础产业发展滞后于加工工业所形成的瓶颈制约，以及买方市场背景下的政策局限。他深入剖析了信贷传导机制中的“信贷渠道”效应，指出在需求不足或信息不对称的约束下，单纯的货币扩张往往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为此，他提出必须通过发展消费信贷、扶持中小企业等制度创新来打通金融传导的梗阻，确保金融血脉能够精准地服务于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这些扎根中国大地、回应时代之问的原创性探索，不仅是中国货币政策理论演进过程中的标志性成果，更是将“人民币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转化为治理实践的生动写照。

六、结 论

回溯学术发展的历史脉络不难发现，货币政策理论从来不是脱离特定国家制度条件和发展道路的通用分析范式，而是对本国实践作出有效解释的系统性知识体系。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货币政策研究历经长期积淀已充分印证，国内货币金融发展具备独有的演进逻辑和运行特质。一代代学者始终立足国情大势，紧扣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坚持深耕探索，推动中国货币政策研究完成从经验归纳、学习借鉴向理论自省、自主建构的阶段性跨越。东财学者的相关探索，亦是这段学术发展历程中极具典型意义和示范价值的研究实践。面向未来，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仍需继续深度扎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从中持续提炼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学理支撑和治理镜鉴。

参考文献:

- [1] KEYNES J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37, 51(2): 209-223.
- [2] 周骏. 如何计算市场货币需要量[J]. 经济研究, 1965(9): 38-44.
- [3] 林继肯. 论正确处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59(1): 44-52.
- [4] PHELPS E S. Phillips curves, expectations of inflation and optimal unemployment over time[J]. Economica, 1967, 34(135): 254-281.
- [5] FRIEDMAN M.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8, 58(1): 1-17.
- [6] 林继肯. 论货币流通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J]. 经济研究, 1963(2): 24-30+23.
- [7] 吴念鲁, 陶湘. 西方货币制度的改革和前景[J]. 教学与研究, 1979(4): 61-68+51.
- [8] BARRO R J, GORDON D B. Rules, discretion and reputation in a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3, 12(1): 101-121.
- [9] TAYLOR J B. Discretion versus policy rules in practice[J].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1993, 39: 195-214.
- [10] 黄达. 综合平衡与货币流通[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1981(5): 7-13.
- [11] 张贵乐, 夏德仁. 进一步改革银行体制为中央银行调节经济创造条件[J]. 财贸经济, 1985(3): 16-20.
- [12] BERNANKE B S, MISHKIN F S. Inflation targeting: a new framework for monetary policy?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 11(2): 97-116.
- [13] 谢平, 罗雄. 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检验[J]. 经济研究, 2002(3): 3-12+92.
- [14] GAGNON J, RASKIN M, REMACHE J, et al. Large-scale asset purchases by the federal reserve: did they work? [J].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11, 17(1): 41-59.
- [15] 马勇. 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理论及经验基础[J]. 金融研究, 2019(12): 18-37.
- [16] 姜富伟, 胡逸驰, 黄楠. 央行货币政策报告文本信息、宏观经济与股票市场[J]. 金融研究, 2021(6): 95-113.
- [17] 林继肯. 关于货币的本质问题[J]. 经济研究, 1964(12): 41-48.
- [18] 黄达. 银行信贷原则和货币流通[J]. 经济研究, 1962(9): 1-8.
- [19] 刘光第, 周骏, 周林, 等. 如何发挥银行在宏观经济中的调节作用[J]. 金融研究, 1983(11): 33-44.
- [20] 周升业. 银行与货币供应的调节[J]. 金融研究, 1986(1): 14-17+38.
- [21] 黄达. 关于控制货币供给量问题的探讨[J]. 财贸经济, 1985(7): 1-8.
- [22] 赵海宽. 关于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几个问题[J]. 经济研究, 1985(8): 16-19+35.
- [23] 刘茂山. 逐步建立以金融调控为主体的国民经济调控体系[J]. 财贸经济, 1986(11): 38-42.
- [24] 杨培新. 关于我国货币政策的分析和建议[J]. 管理世界, 1986(4): 1-8.
- [25] 王克华, 王佩真. 金融宏观调控模式及方法的选择[J]. 农村金融研究, 1989(7): 45-47.
- [26] 戴玉林. 金融创新: 解决银企不良债务问题的选择[J]. 财经问题研究, 1997(8): 14-18.
- [27] 王学青. 坚持货币基本稳定与经济适度增长——中国“九五”金融发展战略[J]. 征信, 1996(3): 19-22.
- [28] 周骏. 多重货币政策目标下的双目标制[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2(2): 50-52+143.
- [29] 王振山, 王志强.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途径的实证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00(12): 60-63.
- [30] 戴国强, 张建华. 中国金融状况指数对货币政策传导作用研究[J]. 财经研究, 2009, 35(7): 52-62.
- [31] 夏德仁, 张少春, 张奇. 谨慎预期下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利息税与存款准备金政策有效性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5): 94-101.
- [32] 张弘力. 启动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货币政策安排[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2(3): 35-37.
- [33] 吕炜. 体制性约束、扩张性政策与政策效果异化: 兼论此轮政策调控的后续影响及中国经济前景[J]. 财经问题研究, 2011(10): 3-9.
- [34] 王传纶, 阎先东. 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 中央银行的对冲可行性分析[J]. 财贸经济, 1998(3): 3-11.
- [35] 王志强, 孙刚, 邓黎阳. 中国的 MA 模型与一体化政策效果[J]. 世界经济, 2002(7): 19-27.
- [36] 肖兴志, 韩超. 中国银行业监管效果的实证研究[J]. 产业经济研究, 2008(4): 29-36.
- [37] 张亦春, 胡晓. 宏观审慎视角下的最优货币政策框架[J]. 金融研究, 2010(5): 30-40.
- [38] 林继肯. 林继肯选集: 第八卷[M].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2: 329-340.

- [39] 艾洪德,闫思,郭凯.放松信贷约束的NOEM框架下参数校准与冲击响应[J].财经问题研究,2013(6):41-47.
- [40] 张亦春,王国强.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非均衡关系研究——基于双门槛回归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15(6):45-54.
- [41] 曾康霖,吕劲松.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审计思考[J].审计研究,2014(1):31-35.
- [42] 戴国强,方鹏飞.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基于影子银行与互联网金融视角的研究[J].金融论坛,2014(8):13-19.
- [43] 邱兆祥,孙成旺.我国P2P网络借贷的发展现状及其对金融监管的挑战[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4(11):23-27.
- [44] 李扬.完善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的金融改革议题[J].经济研究,2014,49(1):8-11.
- [45] 熊海芳,王志强.利率平滑与央行政策偏好的非对称性——中国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3(11):41-54.
- [46] 范立夫,周继燕,王全.回购利率与SHIBOR联动效应问题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5(7):80-87+159.
- [47] 路妍,刘亚群.美日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4(4):97-106.
- [48] 白钦先,薛阳.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哲学思考[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56-60.
- [49] 吴念鲁,杨海平.经济金融风险传染的防范与治理——基于资产负债表视角的分析[J].西南金融,2016(2):15-18.
- [50] 徐忠.中国稳健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与货币政策理论的国际前沿[J].金融研究,2017(1):1-21.
- [51] 马勇,张靖岚,陈雨露.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J].金融研究,2017(3):33-53.
- [52] 王永钦,吴炯.中国创新型货币政策如何发挥作用:抵押品渠道[J].经济研究,2019,54(12):86-101.
- [53] 郭晔,徐菲,舒中桥.银行竞争背景下定向降准政策的“普惠”效应——基于A股和新三板三农、小微企业数据的分析[J].金融研究,2019(1):1-18.
- [54] 隋聪,刘青,宗计川.不良资产引发系统性风险的计算实验分析与政策模拟[J].世界经济,2019,42(1):95-120.
- [55] 林继肯.探索创建行为货币学、货币心理学和货币哲学三门新学科[J].财经问题研究,2024(3):29-38.
- [56] 宗计川,刘珍芝,李江艳.政策沟通模糊性、投资者预期与资产价格:实验室检验[J].管理科学学报,2025,28(2):140-153.
- [57] 张成思,孙宇辰,阮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货币政策感知与实业投资[J].财贸经济,2023,44(7):75-90.
- [58] 李斌,雷印如,王健.美联储货币政策溢出、央行预期管理与中国资产价格[J].世界经济,2024(1):57-85.
- [59] 邢天才,王再丰.中期借贷便利工具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基于主成分分析和VEC模型的实证检验[J].金融论坛,2021(7):6-16.
- [60] 康书隆,董剑峰.新型货币政策与地方经济增长:隐性债务渠道[J].经济管理,2023(6):44-61.
- [61] 战明华,汤颜菲,李帅.数字金融发展、渠道效应差异和货币政策传导效果[J].经济研究,2020,55(6):22-38.
- [62] 周上尧,熊琛,屈伸.经济周期中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非对称性之谜——基于商业信用与信贷约束视角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25(1):43-61.
- [63] 刘冲,庞元晨,刘莉亚.结构性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与利率传导效率——来自中国债券市场的证据[J].金融研究,2022(1):122-136.
- [64] 兰晓梅,龚六堂,杨胜刚,等.信贷违约视角下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26(1):92-107.
- [65] 王洪章,陈果静.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N].经济日报,2021-01-10(5).
- [66] 李凤羽,王空,史永东.腐败治理与城投债信用风险:基于中纪委地区巡视的分析[J].世界经济,2021,44(10):157-178.
- [67] 翟光宇,王超,姜美君.人口老龄化、货币政策效果及传导渠道[J].金融研究,2023(4):1-18.
- [68] 马勇,姚驰.双支柱下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效应——基于银行风险承担的视角[J].管理世界,2021(6):51-70.
- [69] 孟宪春.防范房地产市场下行风险的宏观政策选择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5(1):127-141.
- [70] LYU Y, ZHANG X, CAO J, et al. Quantitative easing and the spillover effects from the crude oil market to other financial markets: evidence from QE1 to QE3[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24, 140: 102989.

Thoughts on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Monetary Policy: Exploratory Journey of Monetary Poli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IAN Yingqi, ZONG Jichuan

(School of Finance,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Summary: Focusing on the core issue of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monetary policy, this paper adopts a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comparis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typical academic context analysis.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t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s in which mainstream monetary policy paradigms emerged, as well as the boundaries of their applicability across different periods, and analyzes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countries' economic structure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risk shocks.

At the same time, against the macro-level background of China's economic-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shifts in its stage of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races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China's monetary policy research: from initial drawing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o an integrated reconstruction oriented toward China's realities, and further toward systematic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foundational pillars and strategic approaches for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monetary policy. It also draws on the long-standing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finance discipline at the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UFE), summarizing the sustained contributions of "DUFE scholarship" to the formation of this integrated knowledge system.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monetary policy theory should not be a universal model divorced from a country's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path, but a systematic knowledge system formed in response to practical governance task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netary policy research shows that domestic monetary and financial operations follow a unique evolutionary logic and face specific governance constraints. Looking to the future,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monetary policy should adhere to taking China and the times as the frame of reference, unifying the practical foundations, problem orientations and disciplinary endeavors of the subject. Looking back, the finance discipline of DUFE has long been rooted in China's monetary and financial practice, forming a continuous academic tradition in academic explor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social service and discourse. Professor Lin Jiken'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n stabilizing currency, the law of money circulation, and the idea that "the RMB should serve the people," as well as other DUFE scholars' continuous research on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structural regulation, policy communication, financi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together represents DUFE's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monetary policy.

Key words: monetary policy;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责任编辑: 刘欣琦)

[DOI]10.19654/j.cnki.cjwtyj.XXXX.XX.001

[引用格式]连英祺, 宗计川. 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思路——兼论中国特色货币政策探索历程与东财贡献[J]. 财经问题研究, XXXX(XX): 1-15.